

清代满语文学史略

赵志忠 著

满族及其先人一直信仰古老的萨满教，在满族文化、萨满教、萨满教与中原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接触中，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儒、道、佛教的影响。历史上，满族曾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其文学也深受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满族文学比较发达，除了源水和发扬了先人们的文学之外，在清代的近三百年间有了很大的发展。民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歌谣、说唱文学等。其中说唱文学中的子弟书、八角鼓、岔曲、牌子曲等，在清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文学在清代达到的最高峰，是小说、戏曲、散文家的涌现，是满族及其先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辽宁民族出版社

第一章 导 论

满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满族及其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满族文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满族文学反映了满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及其文化。满族文学是满族及其先人在历史上创作的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部分。在满族文学中，既有用汉文创作的作品，也有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满族的神话、说唱文学、戏剧以及曹雪芹、纳兰性德、文康、顾太清、老舍等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满族及其文学

满族在东北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历史最为悠久。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满族人口为9 821 180人，仅次于汉族和壮族，在全国56个民族中名列第三位。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其次在北京、河北、内蒙古、新疆等地。满族历史上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1599年额尔德尼和噶盖根据蒙文字母创制了满文，1632年由达海进一步改进。现在，我国黑龙江省的黑河

市、富裕县等地区极少数满族还能讲满语。除研究者外，满族民间懂满文的人已经很少了。

满族的先人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汉、三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宋、辽、金、元、明时期的女真。1616年，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了后金政权。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旧称，定族名为“满洲”（manju）。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代封建王朝——清朝。

满族及其先人一直笃信古老的萨满教，在满族文化中萨满教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满族在与中原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接触中，也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佛、儒、道教的影响。历史上，满族曾以“国语骑射”为主要的民族特征。

满族文学比较发达，除了继承和发扬了先人们的文学之外，在清代的近三百年间有了很大的发展。民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歌谣、说唱文学等。其中说唱文学中的子弟书、八角鼓、岔曲、牌子曲等，在清代文坛影响很大。作家文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大量的诗人、词人、小说家、散文家的涌现，是满族及其先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满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仅就子弟书、京戏以及曹雪芹、纳兰性德、文康、顾太清、老舍的贡献而言，满族文学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子弟书为清代八旗子弟所创，从乾隆初年开始一直到清末，在清代曲坛活跃近二百年。其《红楼梦》子弟书、满汉合璧、满汉兼等子弟书段子一直影响着曲坛，并成为研究中国曲艺的重要资料。郑振铎先生在其编辑的《世界文库》中，将子弟书作家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作家相提并论。著名戏曲研究家赵景深先生认为，“子弟书虽然大多以中国明清小说、戏曲为题材，但究竟不是小说、戏曲，而是叙事诗。中国叙事诗过去著名的只有

《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现在子弟书这类叙事诗却是大量的，其中好多篇杰作并不比《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逊色”^①。同时，他还希望中国文学史也能让子弟书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历史的原因，子弟书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曲坛的“绝响”。

中国京戏被称作“国宝”与“国粹”，常常被人们谈论得津津乐道。但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产生于清代，与满族上层及满族人的喜好、审美情趣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在清代的近三百年间，满族人虽然受汉族文化影响较重，文人们也喜好风雅，填词作赋，但他们的骨子里并没有那么多的“之乎者也”、“仁义礼智信”，也并不蔑视小说、戏剧等俗文学作品，反倒觉得子弟书、小曲等段子也比较高雅，容易上口、演唱。这种认识并不是下层旗人的认识，而是整个满族人的认识，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普通老百姓。从一定意义上说，清代满族上上下下对俗文学的喜好正是京戏能够在清代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条件，京戏能否产生，并且发展成为国戏就很难说了。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京剧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京剧的开端是清代乾隆末年徽班进京演出为乾隆皇帝祝寿。徽班进京后，博采众长，融徽、秦、昆腔于一炉，迅速风靡京城。后来，安徽的徽班接踵而来，在与当时的昆曲、秦腔、京腔、柳子戏、罗罗腔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道光七年（1827），湖北汉剧班入京献艺。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徽班与汉班相互取长补短，从并存进而合流，由量变发展到质变。道光二十五年（1846）前后，京城的各种腔调衰落，京剧完成了从孕育到形成的阶段，以全新的面貌称雄剧坛。从中可以看出，清王朝对徽班和汉班的喜好与支持，以及在京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说来也巧，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期，即元杂剧与京剧都与少数民族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系。元杂剧偏偏产生在蒙古人统治的元代，京剧也偏偏产生于满族统治的清代。这，不能不让人深思。凡是接触过戏剧的人总是要问这样的问题，古希腊戏剧早在公元前就产生并且达到了辉煌，中国戏剧为什么产生得那么晚？几百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换一种思维方式，从中国戏剧产生的时代去考虑考虑呢？元杂剧产生的背景和环境与京剧有些相像，蒙古人对俗文学的喜好与支持，对元杂剧在元代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元杂剧也很难产生与发展。

满族人对京剧产生与发展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审美观念上，而且还直接参与了京剧的完善、改革，甚至演出上。票友在清代极为盛行，他们在传播京剧，扩大京剧影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票友这个行当中，不乏满族人，其中包括王公贵族、贝勒、贝子。清代，尤其是嘉道以后，长期和平无仗可打，八旗兵丁及王公们多有泡茶馆的习惯。茶馆与说书、唱戏是分不开的。久而久之，这些人就喜欢唱上几句，甚至“票”上一把，过过戏瘾。近人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早年王公府第，多自养高腔班或昆腔班，有喜寿事，自在邸中演戏”^②。并说，清嘉庆、道光年间的贝勒奕绮，同治、光绪年间的贝勒载澄都是当时著名的票友，经常参加演出，在京城颇有名气。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人受到了歧视，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只好以唱戏作为职业，用以维持生计。那些昔日的票友，也就只好下海了，有的甚至成了名角。

在 20 世纪初中国京剧的辉煌时期，满族的专业演员可以找出一大串，其中有一些还是相当著名的。比如黄润甫、汪笑侬、陈德霖、龚云甫、钱金福、红豆馆主、清逸居士、卧云居士、慈瑞全、金仲仁、金少山、程砚秋、奚啸伯、李万春以及后来的李玉如、江新蓉、关肃霜等。这些人在中国京剧史上都

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就好像在相声演员中可以找出一连串满族著名演员一样，如常宝堃、侯宝林、常贵田等。对俗文学的喜好以及对旗人生计的需求，使得满族人与京剧、曲艺等俗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汪笑侬不仅是一位演员，而且还是一位京剧改革者。在清末和民国初期的京剧舞台上，他改编、创作、移植的《党人碑》、《哭祖庙》、《骂安禄山》、《骂阎罗》等剧目，直指统治阶级，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在演唱方面善于吸收汉剧、徽剧、昆曲、粤剧的长处，丰富了自己的演唱，形成了自己的汪派艺术。在晚清至民国期间，陈德霖被称作“青衣泰斗”，龚云甫被称为“老旦领袖”，慈瑞全与当时的萧长华、郭春山并称“丑行三大士”。在上面所列著名京剧演员中，红豆馆主、清逸居士、卧云居士、金仲仁都是出身于清宗室爱新觉罗氏的演员。红豆馆主本名溥侗，为道光帝之孙载治第五子，曾封为二等镇国将军，被人们称为“票界大王”，尊为北京的“票界领袖”。清逸居士本名溥续，曾袭封为庄亲王，民国初年落为平民，业余嗜好京剧，常常粉墨登场，后来成为京剧剧作家。卧云居士原名毓铭，后改赵静尘，为京剧老旦演员。金仲仁本名爱新觉罗·春元，清礼亲王之后，曾袭奉恩将军爵位，为京剧著名小生演员。后来的程砚秋、李万春及关肃霜在中国京剧舞台上的地位不言自明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满族上层对京剧的喜好与支持，没有满族人民的参与，京剧就很难有昔日的辉煌。

在整个清代文学中，曹雪芹、纳兰性德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大家，并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曹雪芹的族属问题上，研究者们历来有分歧。一些研究者一直不承认他的满族族属，认为他应该是汉族作家。其主要理由是，曹雪芹的祖上为汉人，他具有汉人的血统。从表面上看，这个理由很

有道理，能够站住脚。但经过仔细的分析，又觉得此话有点欠妥。其一，什么是民族？不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还是从中国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实际出发，民族都不等同于血统。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民族从来就没有按照血缘来划分，而是依照共同的经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民族心理来划分。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多民族的国家可以从秦始皇算起。汉民族一开始就与苗、越、东夷等边民来往，并且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而且吸收了大批的少数民族人口。历史上的“五胡乱华”、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的建立，都使得各民族人口相混杂。不论哪一个民族都很难说自己民族的血统是纯而又纯的，汉族人口更是如此。即使是从全世界的民族发展看，也很难找到血统完全纯正的民族。无可非议，曹雪芹家族是汉族血统无疑。但到了曹雪芹这辈儿，他们家已经加入了满洲八旗，并且在满族这个圈子里生活了一百多年，其思想感情、风俗习惯已经完全满族化了。

从历史上看，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与满族人有着不解之缘。从一定意义上说，曹雪芹的祖先如果不加入满族，他就不会生活在满族圈子里，没有了满族生活，也就没有《红楼梦》。

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月无考。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曾孙：曹寅，原任通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元孙：曹颀，原任郎中；曹颉，原任员外郎；曹頔，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祐，原任州同。”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曹家虽系包衣出身，但上百年过去了，他们不仅加入了满洲旗籍，而且已经成为满洲中的“名门望族”，上了官

方权威的满洲通谱。其家从远祖曹锡远算起，到曹雪芹共六代，几乎代代为官，而且越做越大。其中，曹雪芹的太爷曹玺曾任工部尚书和江宁织造。曹雪芹的太奶奶，即曹寅的母亲，曾做过康熙皇帝的乳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时为江宁织造，并著有《楝亭诗钞》5卷、《词钞》1卷，还主持编辑过《全唐诗》。曹寅作为康熙的伴读，几乎与康熙同时长大，从小关系甚好。康熙即位后，更是百般信任曹寅，曾多次派他到南方担任要职。“织造”一职，名义上是掌管宫廷内部的衣服、物件织造事务，而实际上权势很大。乾隆年间人袁枚，在所著《随园诗话》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曰：‘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耳目。’”其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康熙在位曾六次南巡，其中四次是曹寅在职出面接驾的，并以其织造府作为皇帝行宫。同时，曹寅还经常上奏江南事，并得到康熙帝的硃批。一次，康熙在其奏折上批道，以后有关地方诸事，“必具密折来奏”。还有一次，康熙得知曹寅得疟疾，便马上赐药，并破例用驿马星夜送去。所有这些可以看出，曹寅一家与皇家的亲密关系。

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其子曹颀接任江宁织造。不久，曹颀去世，其弟曹頔又接任。曹雪芹的父亲曹頔做江宁织造不久，就于雍正六年（1728）卸任回京，当年曹雪芹约有10岁。曹家被抄家时，“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四十口”。还有外人“欠曹頔银，连本利共计三万二千余两”。曹家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几十年，其地位、财产与当时的王爷相比，可以说不分上下。后来因曹家败落，曹雪芹中年困于北京西郊，著书《石头记》。乾隆二十七年（1763）除

夕卒，终年40余。

不仅如此，曹寅的两个女儿也分别嫁给了王爷。其中一位“适镶红旗平郡王讷尔苏”，另一位“适王子侍卫某”。平郡王讷尔苏为克勤郡王岳託的重孙，康熙四十年（1701）袭平郡王，雍正四年（1726）因罪革爵，乾隆五年（1740）卒，并按郡王品级下葬。其子福彭，于雍正四年（1726）袭平郡王，乾隆十四年（1749）薨。福彭第一子庆明，于乾隆十四年（1749）袭平郡王，乾隆十五年（1750）薨。讷尔苏之孙庆恒，于乾隆十五年（1750）袭平郡王，四十四年（1779）薨。从亲戚关系上看，平郡王讷尔苏是曹雪芹的亲姑父，平郡王福彭是曹雪芹的表兄，平郡王庆明、庆恒则是曹雪芹的晚辈。应该说，曹雪芹从小就与克勤郡王府及其大小王爷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平郡王福彭，与曹雪芹同辈，彼此来往甚密，并且具有共同的文学爱好。平郡王福彭至今仍有诗作流传。

曹雪芹生于江宁织造府，回到北京那年大约有10岁左右。他在北京生活了30多年，并结交了一些包括王爷在内的宗室文人。其中，与他和《红楼梦》有关的人为怡亲王弘晓，英亲王阿济格四世孙墨香，英亲王五世孙敦敏、敦诚和恂勤郡王嫡孙永忠等。

怡亲王弘晓（1722—1778），号冰玉道人，又号冰玉主人，怡亲王永祥之子，雍正八年（1730）袭怡亲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薨。他的文学修养很高，著有《明善堂集》，并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平山冷燕》题词，阐述了自己较为进步的小说观。曹家与怡亲王府有一定的关系，雍正初年曹家被抄，怡亲王允祥曾奉命监管过曹家事情。怡亲王弘晓对红学贡献最大的是，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石头记》。红学界称这个本子为“己卯本”或“脂怡本”。这个本子是目前所见诸本子中比较早的一种，也是怡亲王府对《红楼梦》研究所做的重要贡

献。

在众多的亲朋好友中，敦敏、敦诚兄弟可算是曹雪芹的挚交。他们虽是英亲王之后，但宗室之间的争斗已使他们心灰意冷，生活上也与曹雪芹相近。共同的文学爱好和志向使他们成为知己，彼此信任，彼此帮助，甚至互赠诗文，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敦敏有自己的诗集《懋斋诗钞》，敦诚也有诗集《四松堂集》。在这两本诗集中，有十多首是直接写曹雪芹的，为后人了解和认识曹雪芹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如《寄怀曹雪芹》、《赠曹雪芹》、《赠芹圃》、《怀曹芹溪》、《佩刀质酒歌》等诗，一直为红学家们所珍视。“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名”，“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等诗句，是对曹雪芹家事、人品、性格等方面的真实写照。

曹雪芹家道败落，典籍无名，给我们留下的材料很少。裕瑞（1771—1838）在其《红楼梦》评论集《枣窗闲笔》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曹雪芹的画像，“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裕瑞为豫亲王多铎五世孙，乾隆六十年（1795）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历任副都统、护军统领等职，嘉庆十八年（1813）被革职，发往盛京。他所著评论集《枣窗闲笔》有七篇为评论《红楼梦》续书之作，并多有见地，堪称宗室红学家第一人。

还有一位宗室怪人永忠不能不提。永忠（1735—1793），字良辅，又字敬轩，号蕖仙，又号栟榈道人、如幻居士。永忠的祖父为康熙第十四子允禩。他在与皇四子胤禛争位中落败，被雍正软禁，直到乾隆皇帝即位才得到释放，并复封恂郡王。经过这样一场政治斗争，允禩觉得很失意，晚年皈依佛、道。永忠的父亲弘明，雍正十三年（1735）封为贝勒，乾隆三十二

年（1767）卒。弘明深受父亲的影响，对红尘也无兴趣，独衷佛、道。永忠在少年时代，其祖父允禔就请剩山和尚、雪亭上人为爱孙的师傅。在而立之年，其父弘明给永忠的礼物是棕衣帽和拂尘。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永忠，不但从父祖惨痛的经历中得到了教训，而且比他们走得更远。《嘯亭杂录》中说他，“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书异籍，必买之归，虽典衣绝食所不顾也”。一个高贵的皇亲贵胄竟是经常不穿衣，不穿鞋，在大街上到处乱跑，可真有点大失体统。永忠 22 岁那年按例被封为辅国将军，但在他的诗稿扉页上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何必预商量！只今只说只今话，一枕黄粱午夜长。”整个一首，看破红尘，无怨无求的“好了歌”。他除了参禅学道外，还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文学艺术上。他的艺术修养很高，可以说集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家为一身，并著有《廷芬室诗稿》传世。永忠与曹雪芹并不相识，当他偶而从敦诚的叔叔墨香处看到《红楼梦》时，感到是一种终生的遗憾。因为当时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曹雪芹已经去世 5 年了。永忠从《红楼梦》中似乎看到了自己家庭的兴衰过程，从贾宝玉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满怀悲愤地写下了《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其中一首为：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这首绝句，在整个《红楼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者不但高度评价了《红楼梦》，而且对曹雪芹、对宝黛爱情、对自身的感触都尽收笔下，可以说句句传情，字字千钧。“传神文笔足千秋”一句，脱口而出，几成定论，为后人

评价《红楼梦》确定了方向。“不是情人不泪流”，既是说的《红楼梦》，也是说的他自己。他与曹雪芹、与贾宝玉可以说是情感相投，同命相连。所以他接着写道，“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其哭曹侯是真，哭自己也是真。哭生前没有见到这样一位知己，哭自己的命运与曹公相似。

总之，清初就加入了满洲旗籍的曹家，在与满族人相处的百余年中，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已经彻底满族化了。从曹雪芹自身来看，他一生下来就生活在满族人的圈子里。他与那些满洲王爷、贵族以及宗室文人的关系甚密。他的《红楼梦》可以说首先是在他们中间传抄，然后才逐渐走向社会，为世人所知的。如果没有满族的文化氛围，没有曹雪芹贵族样的生活经历，也就不会有《红楼梦》。曹雪芹的笔下也就不会有贾宝玉等公子王孙，就不会有荣、宁那样气派的王府。

与曹雪芹相比，纳兰性德的族属问题似乎没有什么争论。其实，纳兰性德的远祖也不是满族，而是蒙古族。其祖上在明朝时为“海西女真”之一，清朝时入满洲旗。入了满洲旗就是满族了，几百年过去了，没有谁来提出疑义。纳兰性德被称作“清代第一词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高度赞扬了纳兰性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③。这一评价几乎成为评价纳兰性德的定论，一直为后人赞叹、折服。这句话好就好在，它指出了纳兰词成功与独树一帜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未染汉人风气”。也就是说，尽管纳兰性德用的是汉族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创作，但由于他出身于满族，他必定有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看待社会。在这一点上，其他汉族诗人是无法相比的。在一些人的眼里，纳兰词似乎以悼亡为主要特色，并以《清衫湿遍·悼

亡》、《南乡子·为亡妇题照》、《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为其代表作。其实他的那些直接描写北国风光的作品、那些写满族风土人情的作品同样重要，更能代表其满族词人的特点。那“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长相思·山一程》），北国风光的描绘；那“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浣溪沙·小兀喇》），北方少数民族风俗的展示；那“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采桑子·塞上咏雪花》），对北国雪花的咏叹；那“有个盈盈骑马过，薄妆浅黛亦风流，见人羞涩却回头”（《浣溪沙·一半残阳下小楼》），满族少女形象的描绘等等，都是难得的代表作品。纳兰性德之所以是纳兰性德，他之所以成为清代第一词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他是少数民族，他用自己的眼睛看人观物，与众多的汉族词家相异，尽管他用了汉族传统的文学形式，甚至用了汉族语言文字。

与纳兰性德并称的满族词人，还有清末的女词人顾太清。近人徐世昌在所辑《晚晴簃诗汇》中说：“八旗论诗，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语。”^④顾太清，名春，字梅仙，号太清，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祖父鄂昌，为大学士鄂尔泰之侄，曾任甘肃巡抚。乾隆二十年（1755）获罪，被赐死。顾太清一家受牵连，故改姓顾。太清嫁给贝勒奕绘作为侧室时，称作顾太清。她的文学成就很高，并有清代第一女词人之誉。著有词集《东海渔歌》和诗集《天游阁集》。她的词清新、淡雅，趋于自然，很少雕饰。比如“岂为平生偏爱雪，为人间、留取真眉目”（《金缕曲·自题听雪小照》）；“故人千里寄书来，快些开，慢些开，不知书中安否费疑猜”（《江城梅花引·雨中接云姜信》）；“昨日送春归了，枝上残红渐少。帘外绿阴多，满地落花谁扫？休扫！休扫！一任东风吹老”（《如梦令·送春》）。在中国文学史上，女作家较少，女词人更是难得。一提

到女词人，人们自然会想到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而顾太清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女词人，一位少数民族女词人，因此同样显得重要。

满族人似乎天生就与小说有缘。他们爱看小说，从清初到清末几乎把所有的汉族经典小说都译成了满语。满族中间又“盛产”小说家，曹雪芹、和邦额、庆兰、文康，以至后来的老舍，都是著名的小说家^⑤。胡适先生在评论小说《儿女英雄传》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⑥这里面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一是胡适先生将曹雪芹与文康并列，认为他们都是旗人。也就是说，胡适先生一直把曹雪芹作为满族对待，从来没认为他是汉族人。二是认为《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都是用北京话写作的经典作品。

在中国小说史上，满族小说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这些特点无不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民族文化氛围有关。首先，从内容上看，他们都以自己最熟悉的满族生活进行创作。曹雪芹所写的正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满族贵族生活，文康更是直接写出了清代北京的旗人生活。即使到了老舍生活的年代，他也没有忘记写自己民族的生活，《正红旗下》和《茶馆》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其次，用地道的北京话进行创作。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北京的旗人，北京话是他们最熟悉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还往往夹杂一些满族话，听起来别具特色。如果说曹雪芹是京味小说开创者的话，那么文康就是发扬者、继承者，老舍就应该是集大成者。因为老舍不但完全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而且还将京味文学形成了一个流派，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再次，在满族小说家的作品中不乏幽默。这一点不论是在《红楼梦》中，在《儿女英雄传》中，还是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我们似乎都可以见到。以上三点，虽然不

足以概括满族小说家的风格与特点，但无疑是最主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满族小说家与其他小说家的不同之处和立足于中国小说史之本。

满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与汉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文化接触中，吸收了她们的一些文化精华，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文学上，满族实际上走了两条路：一条是自己传统的文学之路，以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道路；一条是学习汉族文学之路，以汉族语言文字进行创作，反映本民族生活的道路。关于满族传统的文学之路，也就是本书所论述的内容，即满语文学创作的历史，从清初满语文学创作之始到清末满语文学创作的衰落，由于受强大的汉族语言文化的影响，这条路在整个清代走得十分艰难。用满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就很快走向了衰落，为我们留下了较少的作品。用汉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虽然比用满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从时间上要晚许多年，但其发展势头强劲，很快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并且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从整个清代满族文学发展看，用满语创作的作品越来越少，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清末，几乎见不到满语作品了。这正是清代满族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满族文学比较发达，特别是有清一代三百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令世人瞩目。但令人遗憾的是，满族文学研究起步较晚。清朝时期，除了我们能够见到的一些作品（目录）集子，如《白山诗介》、《白山诗钞》、《熙朝雅颂集》、《八旗文经》、《八旗艺文编目》之外，几乎没有一本有关满族文学的评论集、研究集及文学史之类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满族受到了一定的民族歧视，满族人个个自身难保，文学研究也就根本不可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满族文学仍

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真正的满族文学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以后。

满族文学研究之始,是以编写《满族文学史》为契机的。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确定将编写《满族文学史》的任务交给辽宁省。辽宁省立即成立了满族文学史编委会,并且连续几年召开了满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同时创办了《满族文学研究》杂志。要想编写一部《满族文学史》就必须首先研究满族文学,因为在历史上满族还从来没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满族文学史》的编写实际上是一项全国性的工作,几次学术讨论会就集中了全国各地的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经过编写者多年的不懈努力,《满族文学史》终于写出来了。全书共分四卷,约120万字,分别论述了满族先人文学、清代满族文学、近代满族文学、现当代满族文学,并于1989年出版了第一卷。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满族文学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并且硕果累累。先后出版了《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张菊玲)、《清代满族诗词十论》(张佳生)、《满族民间文学概论》(季永海、赵志忠)、《老舍评传》(关纪新)、《萨满的世界:〈尼山萨满〉论》(赵志忠)等论著。同时还出版了众多的满族文学作品集,诸如《满族民间故事选》(东北三省民研会)、《满族神话故事》(傅英仁)、《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张菊玲等)、《子弟书丛钞》(关德栋、周中明)、《康熙诗选》(卜维义、孙丕任)、《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满族文学精华》(朱眉叔等)、《当代满族小说选》(关纪新、王科)等,整理出版的作品集还有《熙朝雅颂集》、《八旗文经》、《白山诗介》、《通志堂集》、《四松堂集》、《夜谭随录》、《萤窗异草》、《鸿雪因缘图记》、《唐英集》、《玉池生稿》等。以上所举各书不过是整个满族文学研究成果

中的一部分，应该说在短短的 20 年间能够出如此多的成果，实在是出乎人们的预料。

第二节 满族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满族文学研究虽然开展得比较晚，但发展得却比较快。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问题就提出来了。诸如，满族文学的源流问题，满族文学的分期问题，满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势必影响到整个满族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尽管研究者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所谓见仁见智，但经过讨论与研究，许多问题是能够趋于一致的。下面，就满族文学研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期达到推动满族文学研究之目的。

一、满族文学之源

“满族文学”的概念应该说是来自“满族”这个概念。因为先有了这个民族才有她的文学及其文化。史学界一般认为，满族是在 17 世纪初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通史》认为，“天聪九年（1635）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满族，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是以女真人为主体，也收拢了部分汉人、蒙古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成员”^⑦。也就是说，满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民族，到现在也只有 300 多年的历史。尽管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否认满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其先人可以追溯到肃慎及其后裔，但已经不是满族自身发展的历史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满族文学也只能从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那天算起了。

满族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吗？从历史到现在，从语言、